



平等让我们彼此更信任

英国伦敦街头骗人的把戏。

埃里克·D. 古尔德、亚历山大·海曾

“相信我”——这是一个往往会令人起疑的常用语。最近，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信任都已成为一种供应稀缺的商品，这一情况蕴含着重大的潜在影响。以全世界街头通行的三张牌赌博游戏或“猜豆子”游戏为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参与这类游戏，因为他们不信任游戏的公正性，或者不相信主持游戏的人。同样地，人们也认为传统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不公平，或者其主持者不值得信任，因此在参与之前，通常想要得到额外的保证。而不断加剧的经济不

平等就是人们不愿意相信经济和政治是公平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研究考察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下行趋势是否是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反应。

社会粘合剂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资本“能让参与者更有效地共同行动，追求共同目标”（Putnam, 1995）。在调查数据中，信任是由所谓的一般化信任来衡

美国和欧洲的不平等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且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

量的，一般化信任是指一个人对朋友或家人之外的非特定个人的信任程度，通常通过类似“一般说来，您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还是认为与其他人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的问题来加以衡量。

在过去40年中，美国的普遍信任已显著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认为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受访者比例已经从50%左右下降到33%（见图）。而且，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掩盖了真正的下降程度。如果控制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普遍信任的下降甚至可能更加明显，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更信任他人。另外，对政府的信任也显示了类似的下降趋势，这可能会威胁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公众对主流政党的支持。

虽然有关其他发达经济体社会资本趋势的证据有限，并且也未显示出一致的模式。但是，最近的非正式证据和选举结果表明，在很多欧洲国家，不满情绪正在酝酿。至于是否会降低信任和社会资本还有待商榷，不过结果通常会是如此。

公平

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不平等都在不断加剧，而这通常被当作是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其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经济结果，或者造成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分裂。

一方面，如果是由家庭背景、人脉关系或者纯粹运气造成的经济差距，而非个人的功绩，这就会显得特别不公平，因此会破坏人们对他人和政府的信任。如果情况的确如此，经济差距就会非常持久，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严重的机会不平等（Putnam, 2015）。

另一方面，经济产出也会破坏社会经济地位。如果社

会经济地位与可以培养信任的共同价值观相关联，那么当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损害信任的一般意义，也就是说，“熟悉才能产生信任”（Coleman, 1990）。根据这种观点，产出不平等预示着会出现社会分层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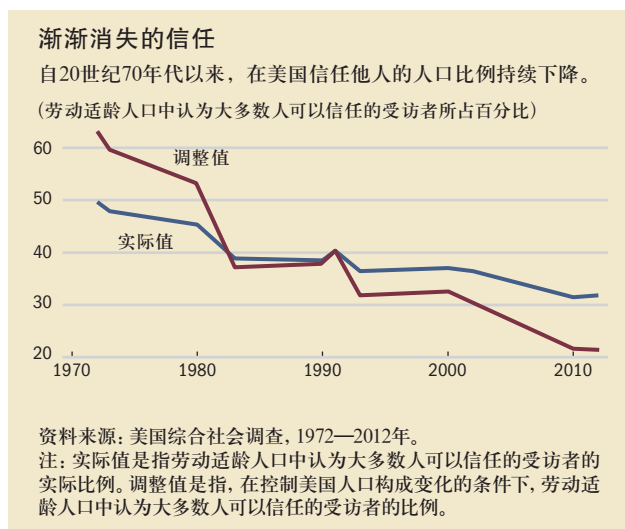
事实上，很多研究结果已表明，普遍信任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例如，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其信任水平较低（例如，Alesina 和 La Ferrara 2002；Rothstein 和 Uslaner, 2005）。而且，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也显示，在较平等的社会，信任水平也更高（例如，Zak 和 Knack, 2001）。当然，这些相关关系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信任水平差异是由其不平等程度的差异造成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不信任和不等都是由第三种因素造成的。所以，证明其因果关系非常关键，因为不信任与不平等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着迥然不同的政策含义。如果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寻求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税收的累进性，增强公共收入对穷人的支持力度。而如果不平等与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是由第三种因素驱动的，则上述措施并不能大幅恢复信任。目前，有关不平等与不信任之间因果关系的系统性证据仍然有限。

美国广泛存在的不平等显著地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

我们的研究也考察了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下行趋势是否是对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反应。我们使用美国全国选举调查的数据来分析美国的情况，使用欧洲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分析欧洲的情况。在对美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时使用各州在不同年份（1980—2010年）的数据，而在对欧洲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则使用欧洲各国在不同年份的数据（2002—2012年）。

研究结果显示，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美国广泛存在的不平等显著地降低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其中，不平等程度上升导致信任水平观察值下降了44%，而且“对政府的信任”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不过，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平等的来源也是造成不平等对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

具体来说，由受教育程度、年龄和经济活动定义的社会经济阶层内部的不平等会损害信任和社会资本，而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则不会损害信任和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看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与自己类似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信任就



会下降，而如果收入差距是由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选择不同而引起的，那么信任就不会受到影响。其中一种解释是，由人力资本决策和投资不同引起的不平等比较容易理解，也显得比较公平，而如果运气或不明因素导致收入差距增大，人们就会对他人和政府失去信任。

此外，在美国，不平等对信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由收入分布带的底部不断扩大的工资差距所推动。然而，这种不平等却并没有表现出要进行重新分配的强烈要求。因此，在考虑税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寻求通过降低市场工资离差（例如，通过最低工资政策或集体谈判）来恢复信任的政策，似乎要比通过更累进的所得税或者增加社会支出的重新分配政策更有前景。也就是说，体面的优质工作和优厚的工资比仅仅增加收入更有意义。

我们在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表明不平等对信任的损害已经超出了美国，并扩散到了制度环境不同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然而，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的不平等对信任的影响更加普遍。研究发现，在收入分布带的顶部和底部，不平等都在损害信任和社会资本。不过，欧洲国家的不平等似乎提高了对更累进的税收或更强的社会保护等重新分配政策的需求。

谁在乎呢？

信任和社会资本的降低令人不安，不仅在于其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还在于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大量的文化经济学文献显示，信任是产生良好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

这些文献强调了信任影响经济的两条途径。第一，信任可以通过用低成本非正式的方式达成协议和维护协议，降低了法律费用和保险费用等交易成本，为私人领域经济互动的发展铺平道路。而且，信任水平越高也可能意味着，在监督雇员和决定合适的奖励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少且成本更低。

第二，信任可以通过减少与提供公共产品有关的集体行动问题，或者提高公共机构的总体质量，从而促进公共领域的合作。因为政府可能无法解决缺乏信任、不宽容、分裂的社会中紧迫的社会经济挑战，尤其是在需要公众大力支持的宪法改革和国际条约方面。而且，不信任也会降低公共政策的可信性，损害其有效改变经济诱因和塑造公民及企业经济行为的能力，从而阻碍政策的有效实施。

另外，也有不断增加的实证证据表明，信任可以通过国际贸易、金融发展、创新、企业家精神、公司生产力等特定的驱动因素，普遍地促进经济增长。例如，缺乏信任的金融系统可能会阻止人们在证券市场投资，谨慎的公司同样会避免进行外包或境外生产，从而错过潜在的获利良机。

鉴于很多发达经济体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信任在经济运行方面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可能会以重要（虽然间接）的方式影响增长和发展。因此，本研究通过提供有关不平等对增长产生不良作用的特殊途径的证据，对其他表明不平等会降低增长的近期实证研究（Dabla-Norris 等人，2015；Cingano，2014；Ostry、Berg 和 Tsangarides，2014）进行了补充。

总之，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可能已经打破了在经济进程、社会动力机制和政治实践中实现公平结果的希望。而较低的经济参与、社会两极化以及从主流政治中撤退可能就是其后果。■

埃里克·D·古尔德（Eric D. Gould）是希伯莱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海曾（Alexander Hijzen）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作者撰写的2016IMF工作论文“Growing Apart, Losing Trust?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on Social Capital”。该文并不代表经合组织或其成员国的意见。

参考文献：

- Alesina A., and E. La Ferrara. 2002.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 207–34.
- Cingano, Federico. 2014.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16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bla-Norris, Era, Kalpana Kochhar, Nujin Suphaphiphat, Frantisek Ricka, and Evridiki Tsounta.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1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Ostry, Jonathan D., Andrew Berg, and Charalambos G. Tsangaride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4/0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Putnam, R. D. 1995.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5.
- . 2015.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thstein, B., and E. M. Uslaner. 2005. “All for All: Equality, Corruption, and Social Trust.” *World Politics* 58: 41–72.
- Zak, P. J., and S. Knack. 2001. “Trust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11 (470): 291–321.